

津民盟经济治理的道路探索与启示

沈晓雷

内容提要 独立 40 年来,津巴布韦执政党津民盟一直在努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治理之路,并因此对津巴布韦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其经济治理主要经历了以“增长与公平”原则为政策基础、以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为驱动力、以黑人经济赋权为核心内容和以“2030 年愿景”为深化经济治理的目标等发展阶段。尽管津民盟的经济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津巴布韦经济仍面临增长剧烈波动、财政收支失衡、货币与金融缺乏稳定性、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和贫困问题突出等诸多挑战。制约津民盟经济治理效能的原因主要包括:殖民遗产的负面影响,过于激进的治理举措,严重的腐败问题,以及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津巴布韦经济发展成效表明,未来津民盟需把经济建设作为兴国之要,加强执政党治理能力建设,根据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经济治理举措。

关键词 津巴布韦 津民盟 经济治理 “快车道”土地改革 本土化政策

作者简介 沈晓雷,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北京 100101)。

近年来,非洲的国家治理问题受到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①然而,在探讨非洲国家的治理问题时,学界对执政党与国家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政党政治是当代国家政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执政党已成为当代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载

^① 梁益坚 《非盟地区治理:非洲相互审查机制探微》,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6期,第23~49页;张春 《非洲政治治理 60 年:多重长期困境与潜在创新出路》,载《西亚非洲》2020年第2期,第66~90页;李鹏涛、陈洋 《殖民地国家的基本特征与当代非洲国家治理》,载《西亚非洲》2020年第3期,第27~45页。

体,并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乃至领导地位。^①对于非洲国家,尤其是那些执政党长期执政且已形成“一党独大型”政党格局的国家而言,执政党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更是如此。执政党可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将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施政纲要变成国家的治理举措、发展政策,从而对国家的发展方向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执政党的治理理念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家的治理理念,执政党的治理政策也可在有选择性地吸收其他政治力量,如反对党和民间组织相关动议的基础上,形成国家的治理政策。从现代国家的治理结构来看,国家治理主要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和社会治理等诸多领域,其中经济治理是政权巩固稳定之根基,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此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在对非洲政党政治的研究中,津巴布韦的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简称“津民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津民盟在1963年8月6日成立,成立时名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此后,凭借系统的革命纲领和出色的组织与动员能力,津民盟迅速成为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主要的领导力量之一。1976年,与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简称“津人盟”)组建爱国阵线后,津民盟遂将名称改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1980年2月,津民盟参加独立后第一次选举,以62.99%的支持率获胜并组建民族团结政府。1987年12月,津民盟与津人盟合并,名称仍保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不变。自独立以来,虽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多党民主化的冲击及在2000年之后受到争取民主变革运动(简称“民革运”)的挑战,但津民盟在历次总统与议会选举中均取得了胜利,已保持长达41年的执政地位,为非洲国家独立以来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

在41年的执政历程中,津民盟已完全将自己的治理理念和施政纲要作为国家的治理举措,尤其在经济领域更是如此。然而,纵观津巴布韦独立后的经济发展数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年份都呈现下降的态势,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一直深陷衰退的困境。由于经济发展步履维艰,津民盟的经济治理

^① 张君《有效执政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1期,第8~9页;吴向伟、吴伟《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执政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与路径研究》,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6期,第49~55页。

被西方学界贴上了失败的标签，被视为非洲国家独立后经济发展的反面案例。^①然而，这一观点既存在政治或意识形态偏见，在逻辑上又有以偏概全之嫌。原因在于，一方面，津民盟在独立初期的经济治理成效显著；另一方面，津巴布韦经济衰退固然有津民盟经济治理不当的原因，但也存在外部干预等制约因素。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津民盟的经济治理，尤其是不同时期所凸显的特点，所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挑战，以及制约其经济治理效能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并以此得出一些可供借鉴的启示。

一 津民盟经济治理的阶段性特点

尽管津巴布韦已独立 40 多年，但津民盟仍坚持认为自己是一个为争取国家彻底政治解放和本土经济解放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并立志要为实现经济独立、繁荣和公平分配财富而不懈努力。^②津民盟所持有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立场决定了其经济发展道路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事实上，津民盟在独立初期确实明确宣布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但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被迫实施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其经济发展道路开始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倾斜。然而，随着世纪之交该国政治、经济矛盾的深化及与其西方关系的恶化，津民盟再次向社会主义转向，尤其是以本土经济赋权为目标实施了“快车道”土地改革和本土化政策。2017 年政治剧变后，津民盟对经济发展道路进行调整，确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路线图，但其“2030 年愿景”和分三步走的战略仍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③总体而言，在 40 多年的经济治理中，津民盟一直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间摇摆，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探索、调整经济发展政策和塑造津巴布韦的经济治理体系，且在不同阶段彰显各自特点。

① See Jacob Chikukwa, *A Crisis of Governance: Zimbabwe*, New York: Algora Publishing, 2004; Richard Bourne, *Catastrophe: What Went Wrong in Zimbabwe?* New York: Zed Books Ltd, 2011; C. Luthuli Mhlahlo and Levar Lamar Smith eds., *The Zimbabwe Crisis: Perspectives, Paradoxes and Prospects (1997–2017)*, New York: Peter Lang, 2020.

② “Who is ZANU PF”, <https://www.zanupf.org.zw/who-is-zanu-pf>, 2021-03-10.

③ Toendepi Shonhe,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nd Mugabe’s Extroverted Economy: What Now Under the Second Republic?”, in Sabelo J. Ndlovu-Gatsheni and Pedzisai Ruhanya eds., *The History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of Zimbabwe: From Mugabe to Mnangagwe*, Gewerbestrasse: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p. 281–295.

(一) 以“增长与公平”原则为政策基础(20世纪80年代)

津巴布韦在1980年独立时,继承了白人殖民政府时期以种族为基础的不平等的经济架构。第一,土地这一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占有严重不均,约6000名大型白人商业农场主占有1550万公顷的土地,而70万户村社地区的农民只占有1640万公顷的土地。^①第二,国民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白人集团的手中,其中320家白人大型制造业公司的产量占津巴布韦制造业总产量的80%,白人大型商业农场提供了33%的正规就业,生产了75%的农产品,占据了95%的农产品市场,创造了近100%的农业出口收入。^②第三,几乎所有技术工作都为白人所垄断,其可占到航空工业技术人员的89%、电器工业的84%、机械工业的68%和汽车工业的69%。第四,白人与黑人收入差距巨大。一方面,二者的平均工资差距比约为11:1,其中农业部门为25:1,矿业部门为13:1,制造业部门为7:1;另一方面,占人口97.6%的黑人只占全国工资和薪金收入的60%,而占人口2%的白人则占到37%。^③

津民盟上台执政后,为了纠正上述不平等的经济现象,将“增长与公平”原则确定为经济治理的政策基础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标。为此,津民盟先后出台了《增长与公平:一项经济政策宣言》《1982/1983年~1984/1985年过渡时期国家发展计划》和第一个《国家发展五年计划(1986~1990年)》,力求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实现收入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尤其是缩小黑人群体与白人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具体而言,津民盟一方面将农业、制造业和矿业作为经济重心,加大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同时承诺不改变原有经济结构,不对白人企业进行国有化,不强制征收白人商业农场,允许外资将税后利润50%汇回投资来源国等,以期实现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为实现收入与财富的公平分配,津民盟实施了土地重新安置计划和黑人经济赋权政策,促进黑人群体经济发展,培育黑

① Sachikonye, Lloyd M., "From 'Growth with Equity' to 'Fast-Track' Reform: Zimbabwe's Land Question",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30, No. 96, Jun. 2003, pp. 228-229.

② Clever Mumbengegwi,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Agricultural Policy", in Ibbo Mandaza ed., *Zimbabw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of Transition 1980-1986*, Dakar: CODESRIA, 1986, p. 210.

③ 何丽儿著《南部非洲的一颗明珠——津巴布韦》,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172页;Godfrey Kanyenz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Zimbabwe Economy, 1980-2000", in Staffan Darnolf and Liisa Laakso eds., *Twenty Years of Independence in Zimbabwe: From Liberation to Authoritarianism*, 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03, p. 37.

人农场主和工商业精英；大力创造就业，改善黑人群体的工作条件和工作待遇，尤其是提高他们的最低工资收入；大幅增加教育、医疗卫生支出和住房补贴，提升黑人群体的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居住环境。^①

此外，鉴于土地在津巴布韦政治与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土地重新安置计划成为“公平与增长”政策的重心。早在民族解放运动时期，津民盟就承诺要在独立后进行土地改革，让广大黑人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1980年9月，津民盟开始实施土地重新安置计划，最初设定的目标是在五年内将1.8万户家庭重新安置在150万公顷土地上，后在1982年11月增加为将16.2万户家庭重新安置在900万公顷土地上。重新安置的对象主要包括穷人、失业者、没有土地或没有足够土地来维持生计的人，以及难民和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等。重新安置的类型主要有A、B、C、D四种模式，其中A模式为个体耕种的模式，每个家庭可获得0.4公顷的居住点，约5公顷的耕地和一定面积的牧场；B模式为集体生产的合作社，每个合作社有50~200个家庭，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劳作，除牲畜外，包括土地和农具在内的其他财产都归集体所有；C模式也是以村落为中心居住，农户也会获得一定的耕地和牧场，但国家会为他们提供核心地产和加工设备，且主要种植烟草、咖啡和饲养奶牛；D模式主要在马塔贝莱兰地区实施，其目的在于通过增加农户的牧场以降低村社地区牧场的压力。^②

（二）以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为驱动力（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末，津巴布韦发展问题逐渐凸显。1989年，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政府债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1%，通货膨胀率达15%以上，国民储蓄率从独立初的23%下降到14%，投资率也从17%下降为10.7%，失业率攀升至26%，青年失业率甚至高达50%。^③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津巴布韦被迫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妥协，在1990年10月宣布实施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以此调适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④津民

① 关于“增长与公平”政策的详细分析，See Christine Sylvester, *Zimbabwe: The Terrain of Contradictory Developmen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Inc., 1991, pp. 97-136.

② 沈晓雷著《津巴布韦土地改革与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8~63页。

③ 何丽儿《津巴布韦政治、经济调整面面观》，载《西亚非洲》1992年第1期，第40页。

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在1982年便开始敦促津巴布韦紧缩财政、削减补贴和放开资本市场，世界银行也在1987年动员津巴布韦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但当时津巴布韦顶住了压力。See Richard Saunders, “Zimbabwe: liberation Nationalism—Old and Born—Again”,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38, No. 127, 2011, p. 124; Vibeke Tralim,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Zimbabwe: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Negotiations with World Bank”, *Forum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No. 1, 1999, p. 60.

盟的经济治理之路由此经历第一次转型,即从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转为以资本主义为重心,该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坚持的“增长与公平”的政策基础,也随之被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理念所取代。

1991 年 1 月 18 日,津巴布韦政府推出《经济改革框架文件(1991~1995 年)》(简称“框架文件”),详细规定了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内容、各产业配套措施、资金来源和实施步骤等。^①根据框架文件,经济结构调整旨在通过经济可持续性高速增长来增加实际收入和降低失业率,而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为从高度管制的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其具体目标是:在 1991~1995 年实现年均 5% 的经济增速;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分别实现年均 5.8%、3.2% 和 5% 的增速;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到 2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年均增长 2%;进出口额均实现大幅增长。

为实现上述目标,框架文件从三个方面规定了未来五年的调整规划。第一,进行财政与货币政策调整,即将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0.7% 降至 5%;将通货膨胀率降至 10%;整顿国有企业,将对国有企业的直接补贴从 6.29 亿津元降至 4 000 万津元;削减 25% 的公务员队伍,并将公务员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6.5% 降为 12.9%。第二,实行贸易自由化。除少量与国防和安全有关的产品外,取消对所有进出口商品的限制;逐步取消商品附加税,并因此而将名义关税税率(关税加附加税)从 19% 降至 14%;将进口税从 29% 降至 23%;降低出口补贴,逐步取消对特定商品,尤其是制造业产品 9% 的免税补贴。第三,减少政府管制。主要举措有:成立投资中心,在 90 天内对 1 000 万津元以下的投资项目进行审批;外资企业全部利润可汇出国外;除基本食品和电力与燃料外,放开对其他商品的价格管制;以及放开对农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地方政府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管制。

框架文件还从人口与健康、教育与培训、农业、环境、能源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制定了配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快土地重新安置的步伐。根据框架文件,津民盟拟在 500 万公顷的土地上重新安置 11 万户家庭,为实现这一目标,将修改《土地征收法》以获取更多的土地来分配给无地农民。此外,框架文件规定经济结构调整的资金来源主要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① Government of Zimbabwe, *Zimbabwe: A Framework for Economic Reform (1991-1995)*, January 18, 1991, Harare, pp. 1-3.

组织、非洲开发银行，以及美国和英国等捐助国。

(三) 以黑人经济赋权为核心内容 (2000~2017 年)^①

20 世纪 90 年代末，津巴布韦治理与发展困境凸显，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涨，通货膨胀严重，实际工资下降，腐败问题高发，以及土地重新安置进程延滞等。上述经济与社会问题叠加，导致广大民众乃至老兵纷纷走上街头，向津民盟表达不满和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民革运在 1999 年 9 月成立后迅速给津民盟的执政地位带来重大挑战，并在 2000 年 2 月的宪法草案全民公投中取得胜利，使津民盟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执政危机和下台风险。^② 在此情况下，津民盟将黑人经济赋权作为其经济治理的核心内容，先后实施“快车道”土地改革和本土化政策，希望在赋予黑人经济权利和实现社会经济更公平发展的同时，重新获取广大黑人民众的支持并对民革运及其支持者予以打击。以此为标志，津民盟的经济治理也重新偏向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共同发展与公平分配的原则。

第一，启动“快车道”土地改革。津民盟在独立后实施的土地重新安置计划并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到 1998 年，仅在约 350 万公顷的土地上重新安置了 7.1 万户家庭，^③ 远没有满足广大黑人民众对土地的强烈渴望和平息他们对土地与财富占有不均的严重不满。2000 年 2 月，在津民盟力推的试图将无偿征收土地合法化的宪法草案全民公投失败后，黑人农民在老兵的领导下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占地运动。以此为契机，津民盟将占地运动合法化并启动“快车道”土地改革。

津民盟将“快车道”土地改革的宗旨确定为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经济增长，废除以种族为基础的土地占有不平等，缓解村社地区的环境和人口压力，以及更充分和有效地利用土地以增加农业产量和实现农业多元化经营等。津民盟还将“快车道”土地改革纳入津巴布韦爱国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称其为第三次“齐木兰加”^④，即第三次民族解放运动，其目标是通过解决不公平

① 事实上，津民盟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开展的土地重新安置计划也具有黑人经济赋权的特征，但当时因其在政治上实行与白人集团进行种族和解的政策，因此这种黑人经济赋权的特性并不明显，且并没有被纳入津民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宣传话语，而只是被置于“增长与公平”原则之下实现公平发展的一项举措。

② 李新烽《津巴布韦“面包篮子”逐渐变空》，载《人民论坛》2018 年第 6 期，第 111 页。

③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Zimbabwe Land Reform and Resettlement: Assessment and Suggested Framework for the Future*, Interim Mission Report, January 2002, p. 5.

④ 齐木兰加 (Chimurenga)，绍纳语，意为“抵抗”或“反抗”。第一次“齐木兰加”指 1896~1897 年反英大起义，第二次“齐木兰加”指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族解放战争。

的土地占有来实现黑人农民的经济赋权乃至彻底解放，并因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津巴布韦“获得主权独立的最后一个殖民主义问题”。^①

“快车道”土地改革最初的目标是获取 500 万公顷的土地并分配给 50 万户家庭，之后在 2001 年 10 月增加到获取 4 558 个农场、总面积为 880 万公顷的土地，以此作为土地重新分配的资源。为了解决土地重新安置时期无法获得足够土地的困境，津民盟决定强制征收闲置土地或未充分利用的土地，农场主委托他人耕作的土地，超过规定面积的土地和与村社地区相邻的土地。^②

与土地重新安置计划类似，“快车道”土地改革也设置了 A1 和 A2 两种不同的土地分配模式，其中 A1 为小农户模式，由耕地和牧场构成，根据自然生态区的不同，面积从 12 公顷到 70 公顷不等；A2 为商业农场模式，又分为小型农场、中型农场和大型农场，根据自然生态区的不同，面积从 20 公顷到 2 000 公顷不等。^③ A1 模式共计划安置 16 万户家庭，获得 A1 农场的人将会从政府获得一定的农业投入和技术支持。A2 模式主要是为培养黑人商业农场主，因此申请者需拥有一定的农业技术和资金。成功申请到 A2 农场的人可获得 99 年租约，以此促使他们增加投入和提高农业生产率。

第二，实施本土化政策。本土化政策是继“快车道”土地改革之后，津民盟所实施的另外一项以黑人经济赋权为核心内容的重大经济治理举措。2007 年 9 月，在津民盟的力推下，津巴布韦议会通过《本土化与经济授权法》，该法案开篇便明确指出，要通过本土化政策实现津巴布韦经济的进一步本土化和对本土津巴布韦人的经济赋权，为此，所有在津巴布韦的非本土企业，既包括此前已成立的企业，也包括以后新成立的企业，都必须将 51% 的股份转让给本土津巴布韦人。

2010 年 2 月，津民盟政府颁布《本土化与经济授权（总）条例》，本土化政策正式得以实施。根据该条例，已有企业自条例实施日起 5 年内，新成立企业自成立日起 5 年内，须将至少 51% 的股份转让给本土津巴布韦人，其

① Robert Mugabe, *Televised Address by His Excellency the President on the Occasion of Zimbabwe's Twentieth Anniversary*, Harare, April 18, 2000.

② Government of Zimbabwe, *People First: Fostering Social Justice & Economic Growth: Zimbabwe's Land Reform Programme*, Information & Publicity,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 Cabinet, Harare, 2001, p. 1.

③ Crispen Sukume, Sam Moyo and Prosper B. Matondi, "Farm Sizes, Decongestion and Land Use: Implications of the Fast-Track Land Redistribution Programme in Zimbabwe", *African Institute for Agrar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 2*, 2004, p. 4.

中资产超过 50 万美元的企业须在 45 日内,新成立企业须在 60 日内向本土化部提交本土化实施计划。此外,该条例还规定了 14 个只允许本地人经营的保留行业,其中包括零售与批发、劳务中介、粮食加工和面包店等。^①

此后,津民盟又相继通过一系列文件对相关产业的本土化政策进行了具体规定。其中,2011 年 3 月的《矿业部门非本土企业提交本土化实施计划的最低要求》规定,矿业企业须在 45 日内向本土化部提交本土化实施计划,在 6 个月内将 51% 的股权转让给指定实体;^② 2011 年 10 月的《制造业企业本土化的净资产、股权比例与最长时限》规定,净资产在 10 万美元以上的非本土制造业企业须在 4 年内完成股权转让,其中第一年达 26%,第二年达 36%,第三年达 46%,最后一年达 51%;^③ 2012 年 6 月的《金融业、旅游业、教育与体育产业、艺术、娱乐与文化产业、工程与建筑业、能源业、服务业、通讯业和交通与汽车制造业企业本土化的净资产、股权比例与最长时限》规定,这些产业的非本土企业须在一年内转让 51% 的股份。^④ 由于本土化政策在执行中并不顺利,2015 年 12 月发布的《津巴布韦本土化实施框架、程序和指导方针》规定,制造业、金融服务业、旅游业、建筑业和能源业等非资源类产业可获得 5 年的宽限期。^⑤

(四) 以“2030 年愿景”为深化经济治理的目标(2017 年以来)

2017 年 11 月政治剧变之后,津民盟实现最高领导人更替,埃莫森·姆南加古瓦接替罗伯特·穆加贝担任党主席和第一书记。此后,津民盟再次对经济治理之路进行调整,一方面,确立“商业开放”、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和建立以私营企业为主导的市场经济路线图;另一方面,为实现包容性发展,出台

① *Indigenisation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 (General) Regulations*, 2010, Statutory Instrument 21 of 2010, pp. 3, 25.

②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Indigenisation Implementation Plans Submitted by Non-indigenous Business in the Mining Sector”, *Indigenisation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 (General) Regulations*, 2011, General Notice 114 of 2011.

③ “Net Asset Value, Lesser Share and Maximum Period for Businesses to Indigenise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digenisation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 Act*, General Notice 459 of 2011.

④ “Net Asset Value, Lesser Share and Maximum Period for Businesses to Indigenise in the Finance, Tourism, Education and Sport, Arts, Entertainment and Culture,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Energy, Services, Telecommunications, Transport and Motor Industry Sectors”, *Indigenisation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 Act*, General Notice 280 of 2012.

⑤ 《津巴布韦本土化实施框架、程序和指导方针》, <http://zimbabwe.mofcom.gov.cn/article/ddfg/qita/201603/20160301282519.shtml>, 2017-03-22.

具有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性质的“2030 年愿景”政策纲要,明确提出到 2030 年将津巴布韦建设成为一个“繁荣与富强的中等以上收入国家”,以期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5 000 美元,就业率升至 80%,贫困率降低为 25%,人均寿命增至 65 岁,以及数字经济达到年均 7%~12% 的增长率等目标。^①

为了按期实现“2030 年愿景”,津民盟制定了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为 2018~2020 年过渡时期;第二步为 2021~2025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三步为 2026~2030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目前,津巴布韦已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根据 2020 年 11 月出台的《第一阶段国家发展战略(2021 年 1 月~2025 年 12 月)》,津巴布韦将在未来五年实现年均 5% 以上的增长率,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 3% 以下,通货膨胀率保持在 10% 以下,经常项目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3%,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 70% 以下,以及共创造 76 万个工作岗位等。^②

此外,津民盟还对本土化政策和土地改革等黑人经济赋权政策进行了改革。就本土化政策而言,2018 年 3 月 14 日,津民盟推动议会出台《财政法》修正案,其中第 34 条对《本土化与经济授权法》进行了修订,规定除钻石、铂金行业仍需遵守本土津巴布韦人至少占股 51% 的规定和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 12 个行业仍为本土津巴布韦人保留外,其他经济部门不再受本土化政策的约束,外国投资者可自由投资并控股。^③ 2019 年 8 月 1 日,津民盟向议会提交《2019 年中期财政报告与补充预算》,表示已将钻石和铂金从本土化名单中删除,股权比例将取决于与投资者之间的谈判。^④ 2020 年 10 月 22 日,姆南加古瓦发表国情咨文,表示将废除《本土化与经济授权法》并出台对投资者更加友好的《经济授权法》,不再对股权持有者的国籍和民族进行限制。^⑤

就土地改革而言,津民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修正:其一,推进土地改革

① Republic of Zimbabwe, *Vision 2030: Towards a Prosperous & Empowered Upper Middle Income Society by 2030*, September 2018, Harare, pp. 5-6.

② Republic of Zimbabw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 (January 2021-December 2025)*, November 16, 2020, Harare, p. xii.

③ *The Finance Act, 2018 (No. 1 of 2018)*, Enacted by the Parliament and President of Zimbabwe, March 12, 2018, Harare, pp. 20-21.

④ Ministry of Finance &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2019 Mid-Year Budget Review & Supplementary Budget: Building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Future Prosperity”, August 1, 2019, p. 65.

⑤ 张玉亮 《津巴布韦拟出台新法吸引国际投资者》, http://www.xinhua.net.com/2020-10/23/c_1126647829.htm, 2021-01-25.

向深入发展,执行“一人一农场”政策,承诺审查并从拥有多家农场、土地闲置或利用不充分的人手中收回土地,以分配给向政府提交土地申请的人,力争使更多的农民“耕者有其田”,以此推动农业革命和确保粮食安全;其二,向前白人农场主伸出橄榄枝,承诺对他们进行补偿,允许他们获得土地并给予99年土地租约,以期重新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为此,津民盟在2019年、2020年和2021年财政预算中分别为白人农场主预留6800万津元、3.8亿津元和20亿津元的补偿金,^①并在2020年7月29日与前白人农场主签署《全球补偿契约》,承诺将向他们补偿35亿美元。如此举能够最终落实,将有助于前白人农场主重新投入津巴布韦农业生产中。

总的来看,独立后津巴布韦执政党津民盟一直在努力探索摆脱贫困落后和实现经济可持续且公平发展的道路。然而,由于津巴布韦各个时期国际环境和国内主要矛盾有所不同,津民盟在不同时期所秉持的治理理念和采取的经济治理政策和举措也存在重大差异,并因此而使其治理体系具有了明显的阶段性特点。而对于津民盟整体的经济治理道路而言,在穆加贝当政的前三个时期,该国一直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摇摆,而到了姆南加古瓦当政的第四个时期,则具有了明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

二 津民盟经济治理的成效

判断一国经济治理的成效,关键要看它是否推动了经济快速且可持续性增长,维持了经济体系的良好运行并惠及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津民盟而言,其经济治理的目标无疑也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并因此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如姆南加古瓦在2017年11月24日的就职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推动经济发展一直都是我们首要的目标……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维持一个公平与公正的社会。”^②然而,确立目标是一回事,能否实

^① Ministry of Finance &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2020 National Budget Statement: Gearing for Higher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Job Creation”, November 14, 2019, p. 72; Ministry of Finance &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2021 National Budget Statement: Building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le of Zimbabwe”, November 26, 2020, p. 173.

^② “Zim is Open for Business – President Mnangagwa’s Acceptance Speech”, November 25, 2017, <http://www.theopc.gov.zw/index.php/200-zim-is-open-for-business-president-mnangagwa-s-acceptance-speech>, 2021-03-11.

现目标则是另一回事。回顾津巴布韦独立 40 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津民盟的经济治理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从当前来看,其所面临的困难则更为严峻。

(一) 津民盟经济治理的成就

津民盟经济治理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其推动了经济发展方面,更重要的是,其通过土地改革而改变了土地这一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本土经济赋权和经济独立,从而为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和实现平等发展与包容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实现了较为快速和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巩固了新生政权。以“增长与公平”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在独立初期取得了积极成效。其一,津巴布韦实现了较为快速的经济发展,其中 1980 年、1981 年和 1985 年分别高达 10.7%、9.7% 和 7.3%,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年均增幅达到 3.4%;^① 其二,土地重新安置计划初见成效,到 1990 年,穆加贝政府共在约 300 万公顷的土地上重新安置约 5.2 万户家庭,且这些农户生产效率颇佳,已可生产全国 10% 的棉花和玉米,并开始种植烟草等经济作物;^② 其三,教育事业获得飞跃式发展,教育投入年均达到 1 800 万美元,占政府财政支出的 16%~18%,小学和中学数量分别从 1980 年的 1 800 所和 200 所增加到 1990 年的 4 500 所和 1 500 所,入学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数量则分别从 1980 年的 81.9 万人和 7.4 万人增加到 1989 年的 226.7 万人和 69.6 万人。^③ 由此也可以看出,津民盟领导的津巴布韦,其经济发展不仅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还关切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并以此提升津巴布韦的经济增长质量。

第二,改变了土地所有制结构,彻底解决了自殖民时期以来白人农场主与黑人农民之间不平等的二元土地占有问题。在“快车道”土地改革的驱动下,到 2010 年,津巴布韦只剩下 198 个白人农场,占地 10 万公顷,仅占总耕地面积的 0.4%。与之相比,A1 和 A2 农场总数则达到 17 万个,总面积约 927 万公顷,如果再加上 2000 年之前重新安置的农场,总面积则达到 1 300 万公

^① Hevina S. Dashwood, *Zimbabw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form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0, pp. 23-24.

^② Jocelyn Alexander, "State, Peasantry and Resettlement in Zimbabwe",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21, No. 61, 1994, p. 335 "Resettlement programme successful-Karimanzira", *The Herald*, April 10, 1990.

^③ Fay Chung, *R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 Memories from Zimbabwe's Liberation Struggle*, Harare: Weaver Press, 2007, p. 279.

顷, 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达到了 39.5%。^①更为重要的是, 根据萨姆·莫约 (Sam Moyo) 等学者的调查, 从“快车道”土地改革中获得土地的人, 主要为无地者、失业者、普通公务员和老兵。^②就改变土地所有制结构和让广大黑人民众“耕者有其田”而言, “快车道”土地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此外, 根据伊恩·斯库恩斯 (Ian Scoones) 和约瑟夫·汉隆 (Joseph Hanlon) 等学者的调查, 到 2010 年, 已经有约 1/3 的“快车道”土地改革农场主通过自身积累和投资而取得了成功。^③

第三,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本土经济赋权和经济独立。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虽然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逐步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 但由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对外高度依赖性的国内经济和殖民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经济遗产, 直到目前都还在为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而努力。与之相比, 尽管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详见下文分析), 但津巴布韦通过“快车道”土地改革和本土化政策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本土经济赋权和经济独立。就“快车道”土地改革而言, 其赋予了广大黑人农民以土地权力, 使津巴布韦的农业发展不再受制于白人农场主, 使土地问题不再像南非那样成为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公平的绊脚石, 津巴布韦也避免了在非洲“新圈地运动”中被外来资本圈占大量土地资源。^④就本土化政策而言, 其使津巴布韦经济保持了相对的自主性与独立性, 使矿产资源等经济命脉没有在全球化浪潮中被外来资本所控制和过度掠夺, 从而为未来的自主性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津民盟经济治理面临的困境

津民盟的经济治理尽管取得了上述成就, 然而自 2000 年以来, 津巴布韦经济一直呈下滑的态势, 并由此而导致其在财政收支、货币与金融体系、产业发展和贫困问题等领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① Sam Moyo “Three Decades of Agrarian Reform in Zimbabwe”, *The Journal of Peasants Studies*, Vol. 38, No. 3, 2011, p. 512.

② Sam Moyo, Walter Chambati, et al., *Fast Track Land Reform Baseline Survey in Zimbabwe: Trends and Tendencies, 2005/06*, Harare: African Institute for Agrarian Studies, 2009, pp. 22, 28; Prosper B. Matondi, *Zimbabwe's Fast Track Land Reform*, London, New York: Zed Books, 2012, p. 70.

③ Ian Scoones et al., *Zimbabwe's Land Reform: Myths & Realities*, Harare: James Currey, 2010, p. 229; Joseph Hanlon et al., *Zimbabwe Takes Back Its Land*, Johannesburg: Jacana Media (Pty) Ltd, pp. 121-128.

④ 关于非洲“新圈地运动”, 参见徐振伟《非洲“新圈地运动”的开展及启示》, 载张宏明主编《非洲发展报告 (2016~201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233~248 页。

第一, 经济增长剧烈波动且呈低迷之势。如前所述, 津巴布韦在独立后的前 10 年取得了较为快速的经济的发展, 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 津巴布韦经济开始剧烈波动且呈日渐低迷之势。在严格执行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的 1991~1995 年, 津巴布韦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 0.74%, 其中 1992 年和 1995 年分别为-6.8%和-3.2%; 90 年代下半叶情况略有好转, 年均经济增长率上升为 2.7%,^① 但各年情况相差很大, 其中 1996 年高达 8.7%, 此后逐年下降, 到 1999 年降为-1.4%。^②2000 年之后, 在“快车道”土地改革、恶性通货膨胀和西方制裁等因素的影响下, 津巴布韦在 2000~2008 年连续九年经济增长率为负数, 其中有 4 年达到-5%以下。2009 年津巴布韦实行以美元为主的多元货币体系后, 其经济增长由负为正, 并在接下来三年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然而从 2013 年起又骤然下降, 连续四年为 2.5% 以下, 此后虽在 2017 年和 2018 年有小幅回升, 但在 2019 年又大幅回落到-6.5% (见表 1)。2020 年,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 津巴布韦经济呈继续下滑的态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下滑幅度高达 10.4%, 这创下了津巴布韦独立以来的最低纪录。^③ 2021 年, 津巴布韦经济增幅有望转负为正, 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将增长 4.2%, 津民盟预测将增长 7.4%。^④ 倘若新冠疫情无法在短期内结束, 则上述增长目标将很难实现。

表 1 津巴布韦 2000~2019 年经济增长率 (单位: %)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增速	-7.8	-0.2	-5.9	-7.4	-3.6	-4.0	-3.6	-3.3	-9.9	5.3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增速	19.7	14.2	16.7	2.0	2.4	1.8	0.8	4.7	3.5	-6.5

资料来源: 根据非洲开发银行 2009 年、2011 年、2016 年和 2019 年《非洲统计年鉴》整理。

第二, 财政收支失衡。津巴布韦属于外向型经济体, 对外贸易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 津巴布韦对外贸易长期为逆差, 以 2016~2020 年为例,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的数据, 商品贸易逆差最高时曾在 2018 年达到 19.75 亿美元。2019 年和 2020 年贸易逆差额大幅下降, 仅为 6.08 亿美

① Godfrey Kanyenze, op. cit., p. 63.

②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 Zimbabwe*, December 2000, p. 5.

③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Sub-Saharan Africa: A Difficult Road to Recovery*, October 2020, p. 22.

④ Mthuli Ncube, *The 2021 National Budget Statement: Building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Recovery*, November 26, 2020, Harare, p. 27.

元和 4.58 亿美元,但下降原因并非因为出口增加,而是源自进口锐减,这也说明津巴布韦的出口创汇能力并没有得到提高。^① 长期贸易逆差再加上因经济低迷而导致税收能力下降,津巴布韦财政收支一直处于失衡状态,其中两项重要指标财政赤字和对外债务一直呈上升的态势。根据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非洲统计年鉴(2020 年)》,津巴布韦财政赤字总额从 2015 年的 4.52 亿美元大幅增加到 2019 年的 28.27 亿美元(图 1)。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21 年国际债务统计》报告,2015~2018 年,津巴布韦的外债总额从 96.79 亿美元增加到 126.46 亿美元,2019 年小幅下降为 122.70 亿美元;外债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例一直高于 50%,其中最高年份达 62%。此外,短期债务占比年均在 30%左右,这反映了津巴布韦每年都面临严重的还债压力。^② 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和对外债务,严重制约了津民盟经济治理的财政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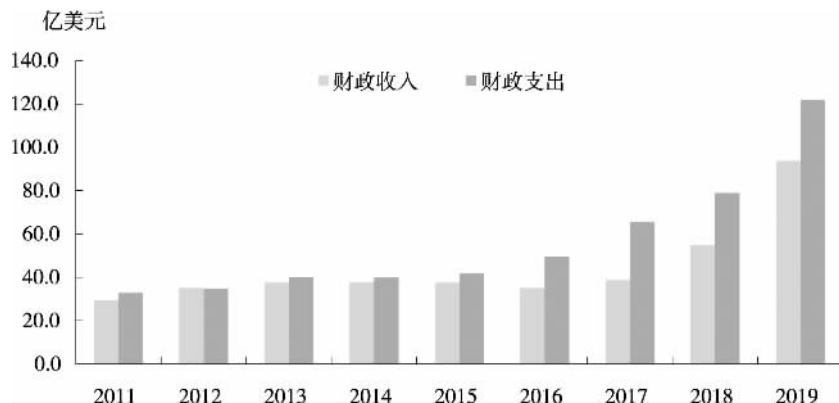


图 1 2011~2019 年津巴布韦财政收支状况

资料来源: AfDB, *Afric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0*, Addis Ababa, 2021, p. 439.

第三,货币与金融缺乏稳定性。近十多年来,货币问题一直是津民盟经济治理和津巴布韦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津巴布韦曾在 2006~2009 年爆发当代非洲最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津民盟政府在此期间发行了三代津元,2009 年 1 月发行的最后一代津元最大面额高达 100 万亿津元。^③

①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 Zimbabwe*, 1st Quarter, 2021, p. 10.

②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2021*, Washington, DC, p. 151.

③ 关于津巴布韦恶性通货膨胀的详细情况, See Tara McIndoe-Calder, *Tara Bedi Rogelio Mercado, Hyperinflation in Zimbabwe: Background, Impact and Policy*, Gewerbestrass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 9-26.

2009 年 4 月,在津巴布韦货币与金融体系彻底崩溃的情况下,津民盟废除津元,实行以美元为主的多元货币体系,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得以遏制,货币与金融稳定性问题暂时得以解决。然而,由于没有铸币权,津巴布韦只能通过外来投资、出口创汇和侨汇等方式获取美元外汇,但在外来投资不足、国际贸易长期为赤字的情况下,其很快便出现美元现金流动性短缺。为此,津民盟先是在 2014 年 12 月发行债券硬币,后在 2016 年 11 月正式发行债券货币,并与美元等价在国内流通。^①但此举并未解决津巴布韦货币短缺和金融稳定问题,电子转账则由此兴起并成为重要支付手段。

2019 年 2 月之前,津民盟坚持美元、债券货币和电子转账等价的政策,但在市场上一直是美元价值高于债券,债券价值高于电子转账,由此从三方面扰乱了津巴布韦的金融秩序乃至经济秩序:一是美元外汇进入津巴布韦后,兑换成债券或电子转账要遭受购买力损失;二是许多商家或采取三级定价,或只接受美元,市场秩序一片混乱;三是人们纷纷囤积美元,进一步导致外汇短缺。2019 年 2 月,津民盟在债券货币和实时全额结算的基础上推出新的货币实时全额结算元 (Real Time Gross Settlement Dollar, “RTGS Dollar”),并启动与美元的浮动汇率,初始汇率为 2.5 :1。6 月 24 日,津民盟放弃美元化,宣布即日起美元和兰特不再是法定货币,津巴布韦元将成为在津巴布韦进行交易的唯一法定货币。此后,津元兑美元的汇率一路下滑,到 2020 年 6 月中旬达到 95 :1,通货膨胀率也随之在 7 月达到 837%。^②为了稳定汇率和遏制通货膨胀,津民盟自 6 月 23 日起实施外汇拍卖制度,每周二拍卖一次,以求通过拍卖来确定汇率。外汇拍卖制度实施半年多来,汇率已基本稳定在 83 :1 左右。^③然而,无论外汇拍卖制度效果如何,毕竟都只是权宜之计,津民盟要想彻底解决货币问题和实现金融稳定,肯定还要从发行并使用本币着手。但在当前经济低迷和外汇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发行本币显然又不现实,因为有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前车之鉴,人们很容易对本币失去信心。就此而言,津巴布韦的货币问题在中短期内难解。

① 张玉亮 《津巴布韦正式发行债券货币》,载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1/28/c_1120002344.htm, 2021-02-11。

②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 Zimbabwe*, 4th Quarter 2020, p. 39.

③ “Exchange Rates”, <https://www.rbz.co.zw/index.php/research/markets/exchange-rates>, 2021-02-14.

第四,产业发展水平较低。津巴布韦在独立后一度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产业门类较齐全和产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由于经济长期低迷且受到财政与货币等问题的制约,津巴布韦的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目前发展已处于较低水平。其一,制造业发展欠佳。制造业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它不仅是维持劳动生产率的保障,对其他产业具有辐射与拉动作用,还可防止产业空心化、抑制泡沫经济和创造大量就业。^①制造业在1990年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4%,为津巴布韦最为重要的生产部门。^②此后在经济结构调整、恶性通货膨胀和本土化政策的多重冲击下,津巴布韦的制造业一路下滑,到2016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低于农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和教育业等产业。^③就发展速度而言,津巴布韦制造业在2011年经历了13.9%的高速增长后,在2012年大幅下滑到5.3%,此后则进一步陷入超低速增长乃至负增长,其中2014年最为严重,达到了-5.1%。^④此外,根据津巴布韦统计局公布的制造业指数,以2009年为100计算,2015~2018年最高仅为66.7,最低则为49.8,还不到2009年的一半。^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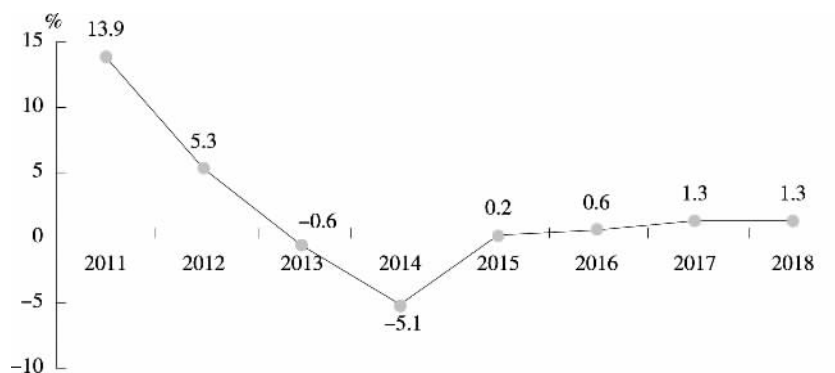


图2 2011~2018年津巴布韦制造业增长率

资料来源: AfDB, *Afric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0*, Addis Ababa, 2021, p. 436.

其二,基础设施滞后。近年来,津巴布韦的电力、供水、燃油和交通等

① 郑艳、陈兆 《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载《当代经济》2019年第11期,第4~6页。

②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 Zimbabwe*, Feb. 1991, p. 3

③ Zimbabwe National Statistics Agency, *Facts and Figures 2017*, June 2018, Harare, p. 14.

④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op. cit., p. 436.

⑤ Zimbabwe National Statistics Agency, *Quarterly Digest of Statistics: Forth Quarter 2019*, March 2020, Harare, p. 57.

基础设施发展都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据统计, 2015~2018 年四年间, 津巴布韦的电力、燃油和供水产业有三年为负增长, 2015 年、2016 年、2018 年分别为-4.5%、-1.8%和-0.6%。^① 笔者曾在 2019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26 日前往津巴布韦调研, 在津巴布韦期间, 哈拉雷、布拉瓦约等大城市供电、供水、燃油均严重不足, 其中最严重时仅在晚上 9 时到第二天凌晨 5 时供电、供水。另有研究表明, 津巴布韦最大电力需求将从 2016 年的 1 842 兆瓦增至 2025 年的 3 018 兆瓦, 如不能增加电力进口或提高国内发电能力, 则 2025 年的供需缺口将达到 1 673 兆瓦。^② 交通基础设施也是如此, 津巴布韦虽然有 3 427 公里的铁路、9 000 多公里的硬化公路, 但由于维修资金投入不足, 铁路大多数路段已无法通车, 公路则是年久失修, 严重影响运输能力。如无法大幅改善道路、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的局面, 未来津巴布韦的经济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制约。

其三, 出口产品仍以初级产品为主。尽管津民盟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时一直强调要通过增加产品附加值的方式来提升出口创汇能力,^③ 但当前津巴布韦的出口产品仍以矿石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为主。据统计, 津巴布韦在 2019 年共出口了 42.7 亿美元的商品, 其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黄金、烟草和镍矿石, 出口额分别为 10.6 亿美元、7.82 亿美元和 7.37 亿美元, 占比分别为 24%、18.2%和 17.2%, 共计达 59.4%。其他排在前十位的也基本是初级产品或初级加工产品, 如镍冶金、铁合金、钻石、甘蔗、铂金和铬矿石等。^④ 从长远来看, 这种情况不但会制约津巴布韦的出口创汇能力, 而且对津巴布韦的工业化和创造就业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第五, 贫困问题突出。尽管津民盟一直努力减缓国内贫困问题, 但近年来该国贫困率仍居高不下。据世界银行统计, 津巴布韦在 2017 年的贫困率(每人每天支出低于 1.9 美元)为 33.9%, 贫困人口达 480 万人。^⑤ 津巴布韦

①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op. cit., p. 436.

② 董亚楠、王盈 《津巴布韦电力投资市场浅析》, 载《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8 年第 4 期, 第 30 页。

③ Government of Zimbabwe, *Zimbabwe Agenda for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Zim-Asset): Towards an Empowered Society and a Growing Economy*, October 2013–December 2018, p. 34.

④ “What Did Zimbabwe Export in 2019?”, [https://trendeconomy.com/data/h2/Zimbabwe/TOTAL, 2021-02-09](https://trendeconomy.com/data/h2/Zimbabwe/TOTAL,2021-02-09).

⑤ World Bank,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0: Reversals of Fortune*, Washington DC, p. 60.

统计局与世界银行共同发布的《津巴布韦贫困更新报告（2017~2019年）》则指出，2017年至2019年5月，津巴布韦每天支出低于1.83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从450万人增加到600万人，极端贫困率则从30%上涨到38%。此外，津巴布韦的贫富分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基尼系数从2017年的44.7增加到2019年的50.4，除10%最富有的人外，其他人的消费支出均出现下降，尤其是10%最贫困的人下降尤为严重。^①

除贫困率高企外，津巴布韦的贫困问题还突出表现在粮食安全问题严重和就业不充分两个方面。以最为重要的粮食作物玉米为例，2016年全国玉米总产量仅为51.2万吨，还不到总需求量180万吨的1/3。^② 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津巴布韦的粮食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估计，津巴布韦在2020年底约有50%的人口（即860万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的困境。^③ 受经济长期低迷和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欠佳的影响，津巴布韦就业不充分问题一直存在。根据津巴布韦统计局2019年对劳动力就业的调查结果，津巴布韦15岁及以上劳动力约为346万人，其中就业人口占84%（约为290万人），失业人口占16%（约为56万人）。而从就业结构看，68%（即197.2万人）为非正式就业或家庭就业。^④ 不稳定的就业状况又进一步导致平均工资水平低和收入不稳定等问题，以2011~2017年为例，在此期间，津巴布韦人均收入年均降幅达3.5%。^⑤ 此外，新冠疫情也对津巴布韦的就业问题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津巴布韦全国总商会在2020年4月发布报告称，新冠疫情将导致津巴布韦损失25%的正式工作和75%的非正式工作，其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是旅游业和制造业。^⑥

综上所述，自津巴布韦独立以来津民盟的经济政策和治理举措在推动津

① Zimstat and World Bank, *Zimbabwe Poverty Update 2017-19*, pp. xvi, 8.

② Sam Moyo “Changing Agrarian Relations after Redistribution Land Reform in Zimbabwe”, in Sam Moyo & Walter Chambati, eds., *Land and Agrarian Reform in Zimbabwe: Beyond White-Settler Capitalism*, CPDESROA 2013, p. 212;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op. cit., p. 437.

③ “Ravages of Acute Hunger will Likely Hit Six in 10 in Zimbabwe: WFP”, July 30, 2020,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0/07/1069321>, 2021-02-15.

④ Zimbabwe National Statistics Agency, *Presentation on 2019 Labour Force and Child Labour Survey (LFCLS) Result*, <http://www.zimstat.co.zw/wp-content/uploads/publications/Economic/Employment/Labour-Force-2019-Results-Presentation.pdf>, 2021-02-14.

⑤ World Bank,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0*, p. 104.

⑥ Zimbabwe 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Sustainable and Flexible Economic Interventions to Address COVID-19”, April 18, 2020, <https://zncc.co.zw/index.php/news/item/25-sustainable-and-flexible-economic-interventions-to-address-covid-19>, 2021-02-24.

巴布韦经济发展、改变土地所有制结构和实现经济独立等方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其当前仍在经济发展各领域面临诸多挑战。如果无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将严重制约未来津民盟的经济治理能力和津巴布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使其难以实现到 2030 年将津巴布韦建设成为“繁荣与富强的中等以上收入国家”的愿景。

三 制约津民盟经济治理效能的基本问题

经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经济治理的效能不仅取决于治理政策本身的合理性及其执行的有效性，还受到治理主体领导能力和治理能力的制约，以及治理进程所面临的国内政治与社会环境及国际关系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一）殖民遗产给津民盟经济治理埋下隐患

尽管津民盟在独立之初所采取的“增长与公平”经济政策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治理成效，但白人殖民政府所遗留下来的殖民遗产，尤其是以种族为基础的不对等的经济架构，还是对当时乃至此后一段时期内的经济治理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一，对于一个新生的且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存在广泛不平等的国家而言，“增长与公平”政策存在结构性矛盾。首先，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津民盟不得不保留甚至支持白人的经济活动，由此便很难真正缩小黑人群体与白人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这对于那些认为推翻白人统治便可过上好日子的广大黑人民众而言，无疑很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其次，津民盟固然为实现经济与社会公平而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在为种族隔离政策买单。更重要的是，这些为实现公平而采取的举措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导致津巴布韦很快便出现财政紧张并因此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借款，从而使津民盟在 20 世纪 90 年代被迫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再次，当津民盟最终因经济增长无法满足公平分配而需要作出选择的时候，无奈将增长置于首位，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农业领域，即支持大型商业农场发展和提高农业生产率，而非加快土地重新安置进程。^①由此导

^① Michael Bratton, “The Comrades and the Countryside: 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al Policy in Zimbabwe”, *World Politics*, Vol. 39, Issue 2, 1987, p. 186.

致的结果是，津巴布韦的经济与社会矛盾不断积聚，并最终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引发津民盟执政危机。

第二，土地重新安置进程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进展缓慢，重新安置的 5.2 万户家庭仅为原定 16.2 万户家庭的 32%，远未解决广大黑人农民的土地需求。重新安置进程缓慢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兰开斯特大厦宪法》所确立的“愿买愿卖”原则的限制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根据这一原则，津民盟无权强制征收白人农场，只能出钱购买土地，且需以市场价格通过外汇支付。这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津民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可供大规模重新安置的土地；二是白人农场主大肆哄抬地价，且只出售降水稀少、交通不便和条块分割的土地，从而人为增加了土地重新安置的难度。^① 20 世纪 90 年代，津民盟希望通过取消“愿买愿卖”原则的限制来强制征收白人农场，以此加快土地重新安置的步伐，但此举并未如愿，由此导致广大黑人农民对土地的需求继续积聚，并最终引发“快车道”土地改革。

（二）过于激进的治理方式使津巴布韦经济遭受重大打击

纵观津民盟独立以来的经济治理举措，有的源于外力推动，如经济结构调整，有的受政治因素所驱使，如“快车道”土地改革和本土化政策，这些措施均没有充分考虑津巴布韦当时的国情且明显过于激进，因此严重制约了津巴布韦的经济发展。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强推的经济结构调整因以西方市场经济运作模式为基础，且其财政紧缩、国有企业改革、贸易自由化和降低政府干预等“一刀切”式做法过于激进，由此产生了诸多负面效果，且大多以失败告终。^② 津巴布韦也是如此。由于相关举措过于激进且没有充分考虑津巴布韦的国情，经济结构调整给该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世界银行都不得不承认其最终失败。^③ 其负面影响主要包括：第一，宏观经济指标不断下滑。1991~1995 年，除年均经济增长率下降到 0.74% 外，通

① 沈晓雷、孙晓萌 《津巴布韦土地重新安置与种族和解研究》，载《世界民族》2018 年第 2 期，第 91~95 页。

② 舒运国 《试析独立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载《西亚非洲》2020 年第 2 期，第 98~99 页。

③ Godfrey Kanyenze, op. cit., p. 74.

货膨胀率基本在 20% 以上, 其中 1992 年甚至高达 40.4%; 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1995 年上升到 12%。^① 1996~1999 年经济小幅回升到 2.9%, 但通货膨胀率却高达年均 32.6%, 政府债务更是攀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95%。^② 第二, 本土制造业发展遭受打击。贸易自由化政策导致制造业产品遭受进口商品的冲击, 大量企业被迫关闭, 其中纺织服装业尤甚。受此影响, 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26.4% 下滑到 1999 年的 17.4%。^③ 第三, 延缓了土地重新安置的步伐。财政紧缩迫使政府大幅缩减投入土地重新安置的资金, 鼓励出口则使政府将重心放在发展大型商业农场和经济作物种植方面, 由此导致 20 世纪 90 年代仅重新安置约 2.1 万户家庭, 还不到 80 年代的一半。^④ 第四, 失业和贫困等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一方面, 精简政府机构、国有企业改革和制造业企业大量破产, 导致就业形势更趋恶化, 失业率在 1996 年达到 35%; 另一方面, 经济低迷, 失业率高涨, 再加上政府对农业、医疗和教育的投入不断降低, 导致贫困问题愈发严重, 到 1995 年已有 61% 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⑤

土地改革在津巴布韦虽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 但“快车道”这一方式过于激进, 且津民盟在决策过程中完全忽视了它可能给津巴布韦农业生产、粮食安全乃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由此所带来的结果是: 过于仓促的土地改革, 使津巴布韦出现了农业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农产品市场混乱、大量没有务农经验的人获得土地, 以及农业投入严重不足等问题。在此情况之下, 津巴布韦的农业生产在 2000~2008 年间出现严重衰退, 主要农作物产量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大幅下滑, 其中最重要的两种农作物玉米和烟草的下降幅度甚至一度高达 60% 以上,^⑥ 粮食短缺自此成为津巴布韦的常

①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Zimbabwe 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 Projec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Report*, Operations Evaluation Department, December 9, 1997, p. 36.

② Godfrey Kanyenze, op. cit., p. 63.

③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 Zimbabwe*, December 2001, p. 5.

④ Sam Moyo “The Evolution of Zimbabwe’s Land Acquisition”, in M. Rukuni et al, *Zimbabwe’s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Revisited*,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s, 2006, p. 146.

⑤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Group, op. cit., p. 22;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n Poverty Zimbabwe 1998*, November 18, 2013, p. 44.

⑥ Sam Moyo “Changing Agrarian Relations after Redistribution Land Reform in Zimbabwe”, in Sam Moyo & Walter Chambati eds., *Land and Agrarian Reform in Zimbabwe: Beyond White-Settler Capitalism*, CPDESROA 2013, p. 212.

态。2009年之后,在津民盟的政策激励和新农场主的不断努力下,津巴布韦农业生产走出低谷,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别实现了33%、9.6%和4.6%的增幅。^①然而,津巴布韦的农业生产仍然具有很大的脆弱性,突出表现为农业投资不足、农业技术落后、机械化程度不高和灌溉设施匮乏,靠天吃饭现象仍普遍存在。受此影响,2013年之后,津巴布韦玉米产量再未超过2012年的水平,其中2015年降幅甚至高达41%。^②就此而言,农业欠发达、粮食短缺和农村贫困问题,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津巴布韦经济治理的难题。

从全非来看,本土化政策由来已久,且已经成为一些非洲国家促进本土经济发展和改善国人经济条件的一项重要举措。除津巴布韦外,采取本土化政策的其他国家还有南非、加纳和乌干达等国。^③但与这些国家相比,津巴布韦的本土化政策要激进得多,不仅对各经济部门强制性地“一刀切”,而且要求必须将高达51%的股权转让给当地人。如此激进的本土化政策并没有产生预期效果。第一,制约了津巴布韦吸引外资的能力。外国投资者持股不得超过49%的规定,使许多外资不敢进入津巴布韦。2012~2017年,津巴布韦年均仅获得4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远不足以满足其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的需求。^④第二,制造业和采矿业两大支柱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受本土化政策的影响,外来投资者不敢贸然投资制造业和矿业领域,原有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也不敢追加投资,有些甚至因本土化压力而被迫关停,由此导致上述两大产业在2009~2012年经历了短暂的高速增长后,在2013年之后陷入低速增长乃至负增长。^⑤第三,深陷美元现金流动性短缺的困境。津巴布韦在2009年实行以美元为基础的多元货币体系后,美元成为该国的流通货币。然而,如前所述,津巴布韦外来投资严重不足,制造业和采矿业等出口创汇能力大幅下降,国际收支则长期为赤字,由此导致该国自2014年起一直深陷美

① Government of Zimbabwe, *Zimbabw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Plan (ZAIP) 2013-2017: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Zimbabwe's Agriculture Secto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Mechanization and Irrigation, p. 3.

②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ric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9, p. 446.

③ 朱伟东《面对非洲国家本土化政策 投资者要理性应对》,载《中国投资》2016年第18期,第73页。

④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8*, New York and Geneva, 2018, p. 185

⑤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ric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9, p. 445.

元现金流动性短缺的困境。由此,上述因素相互叠加成为津巴布韦经济持续低迷的一大诱因。2013~2016 年间,津巴布韦经济增幅一路下滑,分别仅为 2.0%、2.4%、1.8% 和 0.8%。^①

(三) 严重的腐败问题削弱了津民盟经济治理效能的发挥

经济治理与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密切相关,有效的经济治理离不开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津巴布韦经济治理效果不彰的原因不仅仅在经济领域,也有十分突出的政治因素。其中,腐败问题一直是制约津民盟经济治理成效的一大沉痾。独立不久,津民盟就开始受到腐败问题的困扰,在 1988 年的“威洛门”汽车贪腐案中,有多名高官因高价出售进口汽车而被查。^② 20 世纪 90 年代,老兵因赔偿金遭到贪污而走上街头,围攻津民盟总部并迫使穆加贝坐下来谈判。穆加贝在压力之下宣布向所有老兵每人一次性支付 5 万津元(约合 2 778 美元)补偿,且自 1998 年 1 月起每月再向每人支付 2 000 津元(约合 111 美元)补贴。为了支付这些补偿金,津民盟开始大量印制货币,由此导致 1997 年 11 月 14 日当天货币贬值 50% 以上,从而拉开了津巴布韦货币贬值、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的序幕。^③ 在“快车道”土地改革中,有不少农场被津民盟高官及其支持者所得,这也成为外界抨击“快车道”土地改革的一大口实,且这些农场后来大多闲置,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津巴布韦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在透明国际近年来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中,津巴布韦排名一直比较靠后,其中在 2020 年排名为第 157。^④ 尽管全球清廉指数的公正性、权威性和中立性在国际上一直存疑,但其排名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国的腐败情况。事实上,津民盟自身也已意识到津巴布韦所存在的腐败问题。姆南加古瓦就曾指出,津巴布韦人必须养成诚实与努力工作的文化,以防止腐败问题侵蚀国民的价值观。^⑤ 从当前来看,腐败对津民盟经济治理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干扰了津民盟经济治理举措的贯彻执行,增加了津巴布韦经济

①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ric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9, p. 86.

② “Mugabe’s Headache”, *New African*, No. 264, 1989, p. 23.

③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Recovery in Zimbabwe: A Discussion Document*, Harare, 2008, pp. 9–10.

④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20*, p. 3.

⑤ Farirai Machivenyika, “All Must be Honest and Fight Corruption, ED Urges Nation”, *The Herald* (Harare), December 21, 2019.

运行的制度成本,限制了国内外投资的积极性。第二,使津巴布韦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津巴布韦反腐败委员会主席劳艾丝·马坦达-莫约(Loice Latinda-Moyo)曾在2020年1月表示,津巴布韦因贪污腐败每年损失高达18亿美元。^①第三,破坏了津巴布韦的营商环境,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津巴布韦在190个国家中排名第140位,因腐败而导致的办事效率低下和违法违规现象是其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②

(四) 西方国家长期制裁严重恶化了津民盟经济治理的外部环境

自2001年起,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方经济体先后以“快车道”土地改革和2002年总统选举违反人权和财产权、政治暴力、压制反对党、违反法治和民主规则,限制公民言论自由,以及出兵刚果(金)等原因,对津巴布韦进行制裁。欧盟和美国等将对津巴布韦的制裁定义为“定向制裁”(Targeted Saction),制裁手段主要为旅行限制、财产冻结和武器禁运,制裁对象主要为穆加贝政府高官和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以及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等实体。欧盟和美国等西方势力的制裁一直延续至今,在制裁高峰期,欧盟曾将津巴布韦203个人和40个实体、美国将128个人和33个实体纳入制裁名单。^③

欧盟和美国等的制裁主要通过三个渠道限制了津巴布韦的经济发展。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因制裁而大幅缩减对津巴布韦的发展援助与贷款,尤其是美国通过对这些机构的控制和影响,禁止它们向津巴布韦提供新的发展援助或发放新的贷款,并要求它们停止向已有项目发放贷款。第二,将津巴布韦农业银行和基础设施发展银行等国有和商业银行纳入制裁名单,导致它们的国际汇款业务受到严重制约,大量海外账户被迫注销,以及被迫停止在国外发行债券,从而严重破坏了津巴布韦的国际金融业务,尤其是国际融资能力。^④第三,将津巴布韦钢铁有限公司和津

^① “US \$2bn Lost to Graft Annually”, January 24, 2020, <https://www.theindependent.co.zw/2020/01/24/us2bn-lost-to-graft-annually>, 2020-01-26.

^② World Bank Group, *Doing Business 2020*, Washington, DC, p. 4.

^③ Heather Chingona “Zimbabwe Sanc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Lingo’ Guiding the Perceptions of the Sactioners and the Sanctionees”,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 No. 2, 2010, pp. 69-70; 沈晓雷, 前引书, 第205~207页。

^④ Robert Nzaro, Kosmas Njanike and Emma Munenerwa “The Impact of Economic Sanctions on Fiancial Services: A Case of Commercial Banks in Zimbabw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Vol. 1, No. 1, 2011, p. 108.

巴布韦矿业发展公司等国有企业及与受制裁个人相关联的企业纳入制裁名单,导致津巴布韦出口商品失去了美国、英国和欧洲等可为非洲商品提供优惠待遇的市场。

津民盟在 2013 年的竞选宣言中详细列举了其在 2001~2013 年因制裁而遭受的损失:平均每年少获得 3 600 万美元国际援助,少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获得 7 900 万美元贷款,少从国外获得 4.31 亿美元商业贷款;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减少 34.99 亿美元,12 年总损失达到 420 亿美元。^①毫无疑问,这些损失成为津巴布韦经济在 2001 年之后急剧衰退的重要原因。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制裁还导致津巴布韦腐败问题更加严重,^②并对津巴布韦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事业等造成重大冲击,^③从而进一步使津民盟的经济治理步履维艰。

纵观制约津民盟经济治理效能的主要原因,可谓历史因素与现实政策因素并存,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同在。其中,津民盟经济治理的政策与举措等现实政策因素是核心因素,因为它决定着津巴布韦经济发展的方向,并深刻影响着津巴布韦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和健康程度等指标。就此而言,当前津民盟将“2030 年愿景”作为深化经济治理的目标,并由此推出分三步走的战略和就相关治理举措进行改革,如相关政策措施能够得到切实执行,则津民盟有望逐步走出经济治理的困境。

四 余论:关于津民盟经济治理的几点思考

当前,津巴布韦已进入独立后的第五个十年,这也是津民盟提出要把津巴布韦建设成为“繁荣与富强的中等以上收入国家”的关键十年。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总结津巴布韦前 40 年经济治理的成败得失,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津民盟当前在经济治理中所面临的问题,在许多非洲国家也或多或少存在,尤其是那些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如

① ZANU-PF, *Taking Back the Economy: Indigenise, Empower, Development & Create Employment*, 2013, pp. 49-51.

② Munoda Mararika, “Zimbabwe Will Never be a Colony Again!”, *Sanctions and Anti-Imperialist Struggles in Zimbabwe*, Bamenda, Cameroon: Langaa Research & Publishing CIG, pp. 147-150.

③ Chidiebere C. Ogbonna, “Targeted or Restrictive: Impact of U. S. and EU Sanctions on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of Zimbabwe”, *Af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11, No. 3, 2017, pp. 37-40.

南非、安哥拉、刚果（布）和纳米比亚等，近年来也面临类似的经济治理成效不显和经济发展欠佳的问题，对津民盟案例的剖析也可为这些国家执政党的经济治理提供一定的启示。

第一，要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国家治理首先是经济治理，考量一个国家治理水平的首要标准，就是其是否具备良好的经济治理能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国家治理中的具体贯彻和集中体现。^① 津民盟之所以在经济治理中面临诸多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为维持执政地位而采取过于激进的经济政策，此举不但不利于经济发展，更无助于巩固其执政地位。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国家多党选举实践表明，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是最为重要的竞选纲领和获胜砝码。就此而言，在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政治治理要为经济治理服务，而非经济治理要以政治治理为导向。对于津民盟乃至非洲其他国家的执政党而言，要想长期保持执政地位，首先就是要具备良好的经济治理能力，唯有以此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夯实执政的民意基础和多党选举的票仓。2017年政治剧变后，姆南加古瓦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明确提出政治优先于经济的时代已经结束，津民盟将把执政重心放到经济发展上来。^②

第二，要加强执政党治理能力建设。执政党通常能够凭借其手中掌握的资源和权力在国家经济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和发挥领导作用，而要想充分发挥执政党的领导作用，首要的是加强其能力建设。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济治理成效已得到证明的经验，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中国经济治理坚强的领导核心，主导中国经济治理的统筹规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③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治理的进程中，不断调整治理理念，优化治理能力，并在此过程中加强党自身的各项建设。这两个方面的成功经验保证了中国经济政策的不断调适和经济发展能力的不断提升。结合津

① 刘春山、江之源 《论经济法与国家经济治理》，载《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6期，第204页。

② “Economy over Politics, Says ED”，April 22, 2018, <https://www.sundaymail.co.zw/economy-over-politics-says-ed>, 2018-04-23.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民盟政党建设与经济治理的发展历程,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党内团结,避免派系斗争,尤其是正确处理好领导人代际更替问题,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建设而非政治斗争上面。二是革新政治纲领,努力实现从革命型政党向发展型和繁荣型政党转型。三是加强学习,尤其是向经济治理效能较好的国外执政党学习,通过构建学习型政党来创新经济治理理论和加强经济治理战略规划。四是坚定不移进行反腐败斗争,以此降低社会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和不确定性,真正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执政党的经济治理引领能力和经济政策供给能力。

第三,要实行符合本国实际的经济治理举措。经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非一成不变的僵化框架,也无法孤立于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发展环境。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治理的成效,就必须根据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来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经济政策。

对于津民盟乃至非洲其他存在类似经济治理困境的国家的执政党而言,需要在此过程中处理好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处理好殖民遗产的扬弃问题。殖民遗产是当代非洲国家经济治理首先要面临的内部结构性因素之一,有其历史的惯性。对此,非洲国家在独立后应努力对其改造和重塑,使其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一部分。以“快车道”土地改革为例,将农场从白人农场主手中夺走固然解决了以种族为基础的土地占有不平等的殖民遗产,但也因此而破坏了津巴布韦的农业生产结构和生产能力。津民盟当前向前白人农场主抛出“橄榄枝”,希望重新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在以纠错的方式选择性地利用农业生产关系中的殖民遗产。

二是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近代以来,之所以有许多国家因治理失败而陷入经济衰退乃至崩溃的泥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苏联是最为明显的例子,津巴布韦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治理实践表明,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并不矛盾,事实上,它们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而发展则是硬道理和根本目的,唯有发展,才能维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和保证国家的真正稳定。从当前来看,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不少非洲国家都正处于政治社会转型期和经济

发展换挡期,各国执政党在开展经济治理时,应切实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保稳定,以稳定求繁荣。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改革举措应做到稳健、适度、渐进,否则可能会因过激而阻碍经济发展和影响政治稳定,津巴布韦的“快车道”土地改革和本土化政策就是证明。

三是处理好自主发展与对外合作之间的关系。非洲国家自独立以来便处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之中,不但会经常横遭西方国家的干涉乃至制裁,更因在国际生产链、贸易链和价值链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遭受损失。为了摆脱这一局面,非洲国家一直在尝试谋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但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触及西方国家的利益并导致它们的反弹,津巴布韦即是如此。西方国家之所以对其加以制裁,“快车道”土地改革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对于非洲各国执政党而言,处理好自主发展与对外合作之间的关系,至少需要做到两点:首先,坚定自主发展理念,加强自主发展能力,以此减少对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的依赖性;其次,理性选择对外合作对象,不以牺牲本国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发展为代价,且需致力于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四是加强防控风险和化解危机的能力。防控风险和化解危机的能力是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有效防控和化解风险,不但考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更关系到一国经济的韧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共产党经济治理的实践表明,正是通过加强在防控风险和化解危机方面的治理能力,中国经济才能得以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中得以持续高速发展。^①对于津民盟而言,其在经济治理中显然缺乏防控风险和化解危机的能力,新冠疫情之所以给津巴布韦经济带来巨大且持续性影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事实上,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诸多非洲国家近年来一直在持续不断地面临各种突发性风险和危机,这其中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气候变化导致的旱涝灾害、埃博拉和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以及蝗灾等自然灾害。非洲国家执政党要想在这些不利的内外发展环境中保证经济治理成效,具备良好的防控风险和化解危机的能力必不可少。

^① 张慧君、黄秋菊 《中国共产党经济治理能力探析——新中国发展经验总结与未来挑战》,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38~40页。

Path Exploration of ZANU-PF's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Its Inspiration

Shen Xiaolei

Abstract: In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independence of Zimbabwe, ZANU-PF has been exploring the path of economic governance in line with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Zimbabwe'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in different periods include the principle of "growth with equity" as the policy basis,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djustment Plan as the driving force, the 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 as the core content and the "2030 vision" as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economic governance. The economic governance of ZANU-PF has made a lot of achievements, but it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now, including severe fluctuation and downturn in economic growth, imbalance of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poor stability of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low leve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serious poverty problems. The main reasons restricting the efficiency of economic governance includ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olonial heritage, the aggressive governance measures, serious corruption and sanctions imposed by Western countries.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ZANU-PF's economic governance shows that, in order to make fruitful economic governance achievements, ZANU-PF should put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cor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strengthen the ruling party's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formulate economic governance measures in line with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Key words: Zimbabwe; ZANU-PF; economic governance "Fast-track" land reform; indigenisation policy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